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英语专业翻译系列教材



翻译引论

总主编 冯庆华 主编 龚 芬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英语专业翻译系列教材

Fanyi Yinlun

翻译引论

总主编 冯庆华 主编 龚 芬

编者 董海雅 冯晓黎 龚 芬 王少娣 吴珺如 奚 念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引论/冯庆华主编, 龚芬分册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04-031217-1

I. ①翻… II. ①冯…②龚… III. ①英语-语言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5013 号

策划编辑 陈锡镛 周继铭 责任编辑 周继铭 封面设计 顾凌芝 责任印制 张福涛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50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1217-00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以后,翻译成了新形势下的热点,各行各业对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这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在布局上做出了很大的调整。目前这套“英语专业翻译系列”教材已被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是针对社会发展做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

这套教材经过全国高校翻译教育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商讨和策划,筹备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这套教材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注重内容的时代性、科学性、综合性。翻译教材需要大量的实践材料作为支撑,教材的选材必须严谨科学;同时,本科教育的特点是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注重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面,这些正是本系列教材策划者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一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系列教材涵盖理论和实践。《英汉翻译基础教程》、《汉英翻译基础教程》、《英语口语教程》和《报刊语言翻译》较为侧重于实践,而《翻译引论》、《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则较为侧重于理论。二是本系列教材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所有教材都要体现理论指导实践的根本宗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认识理论,并有意识地把理论用于指导实践。

三、体现多种学科交叉的特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翻译也是如此。从我国第一部翻译教程问世,特别是从 1980 年代初期到现在,与翻译相关的学科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90 年代后期又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势头。翻译作为多学科的交叉点,也理应吸收和体现这些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本系列教材的编写者们都是站在本学科前沿的学者,时刻关注着相关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这些学术背景有利于他们把自己的关注点和研究融进教材编写之中。

四、深入浅出。不论是实践性较强的《英汉翻译基础教程》、《汉英翻译基础教程》、《英语口语教程》和《报刊语言翻译》,还是具有一定理论特征的《翻译引论》、《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都力求深入浅出,这正是本系列教材主编和所有参编人员的强项。这套翻译系列教材的作者来自各个高校,全部都是所在单位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骨干,多年来一直从事各种类型的翻译课教学,编写过各种教材和辞典。他们从指导思想到实际行动都体现出很强的“在科研中结合教学,在教学中体现科研”的能力和特点,是本系列教材编写做到“深入浅出”的有力保证。

五、注重能力的培养。很多翻译教材往往就事论事,把视角放在词和句子的层面,这从当时看来,对学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学生只是掌握了一些微观的机械的对应性翻译技能,他们触类旁通的能力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而本教材的编写人员是“居高临下”地去审视翻译中的问题,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注重“授人以渔”。

六、体例协调统一,各教材自成体系。本系列教材内容涵盖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翻译专业

(方向)的几乎所有方面,拟采用较为统一的体例来编写,因此可以配套使用。同时,每本教材的内容又自成体系,各学校也可以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使用。

七、适合时代发展需要。本教材主编和参编人员多年来一直从事各种类型的翻译教学,有些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负责人,有些是翻译专业或翻译方向的负责人,对教育改革和外语教学发展的趋势非常了解。这套系列教材也正是在主编和参编人员的共同调研和协商之后拟定编写大纲的,非常适合未来外语教学发展的需求。

在本系列教材中,有3本教材——《报刊语言翻译》、《翻译引论》和《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都为翻译教学领域内立意新颖的教材,而《英汉翻译基础教程》、《汉英翻译基础教程》、《英语口译教程》都是按照形势发展的要求用全新的概念来策划和编写的。目前规划内的6本翻译教材只是该系列的一部分,我们根据翻译教学的需求还将陆续增补相关翻译教材来进一步充实这套“英语专业翻译系列教材”。

为了更好地做好翻译教学的改革,我们将不断地改进我们翻译教材的编写工作,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使用本套翻译教材的广大专家、教师和同学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不胜感激。

冯庆华

前言

近年来,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国内不少高校都相继设立了本科翻译专业,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学术研究体系。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翻译专业建设与发展却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以翻译教学及人才培养为例,就关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学习者双语综合素质的提高、人文科学知识的积累、翻译技巧的传授、转换能力的培养、翻译理论的拓宽等等。在传统翻译教学中,语言综合素质以外,课堂教学主要侧重于翻译技巧讲解与翻译技能训练两个方面,就一般情况来看,这种取道可谓体现了翻译教学的基本原则,然而对翻译专业而言,则显然缺少基础理论这一支撑环节。毋庸置疑,一定的理论知识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学习者的专业视野,使其更好地了解翻译的性质与实质,从而进一步提高实际动手能力,同时也将为更高层次的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基于这样的理念,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与注重实例评析、技能训练等传统翻译教程相比,本教材更侧重宏观层面的翻译研究,旨在从理论角度为翻译专业学生提供一个“居高临下”的视野,从而使其在学习掌握具体翻译技能之外,能够对翻译学科有一个“纵览全局”的认识与把握。

教材开篇安排了“中国翻译理论概述”及“西方翻译理论简介”两章理论氛围较为浓厚的内容,通过对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过程的系统梳理,可使学生充分了解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从而为他们今后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这种侧重理论、主张理论指导实践的宗旨也贯穿于教材的其他章节。

在章节与内容编排上,为避免与业已出版的同类翻译教材重复,编者适当增加了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翻译策略”一章就归化与异化问题进行客观评析,以便学习者在翻译实践中能够对翻译策略做出适当的选择;另如在“翻译与批评”一章中,编者介绍并细致梳理了各种翻译批评体系,力求为学生提供可资参考的翻译评价体系与评判标准;此外在“风格与翻译”一章中,编者就风格的界定、风格标记、风格可译性、作者风格、译者风格等种种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而“意识形态与翻译”一章则就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及译者的删改行为等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诠释。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作为多学科交叉点,翻译学科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适当吸收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教材还充分体现了译学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在教材后半部分,分别安排了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美学、翻译与文学等跨学科研究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若干方面的系统梳理与分析可望拓宽学习者的理论视野,并进一步引发他们对翻译研究的兴趣。

本教程由龚芬负责规划全书及书稿统稿和终审,各章主要撰写人员如下:第一章——龚芬、奚念,第二章——冯晓黎,第三章——奚念,第四章、第五章——董海雅,第六章——龚芬,第七章——王少娣,第八章——董海雅、冯晓黎,第九章——王少娣,第十章——吴珺如,第十一

章——奚念,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吴珺如,第十四章——董海雅。

尽管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尽力尝试将翻译研究的有关新成果和翻译教学的新理念注入本教材,但是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恳请使用本教程的师生与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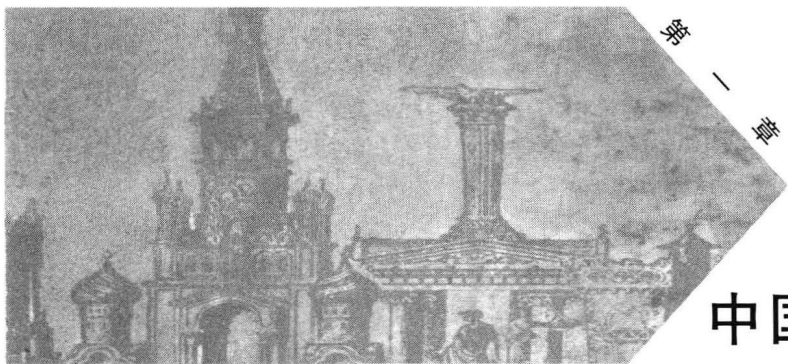
编者 谨识

2011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1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1
	第二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6
	第三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	7
	第四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高潮	23
第二章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43
	第一节 公元前3世纪至中世纪	43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	45
	第三节 17世纪至19世纪	46
	第四节 20世纪至今	51
第三章	翻译概述	70
	第一节 翻译理论的作用和意义	70
	第二节 翻译的定义、目的与意义	71
	第三节 翻译的性质与特点	74
	第四节 翻译的质量标准与效果评价	76
	第五节 翻译的分类与翻译的方法	78
第四章	翻译过程	82
	第一节 译前准备	82
	第二节 细读原文 准确理解	83
	第三节 字斟句酌 表达得体	89
	第四节 校改	92
第五章	翻译策略	93
	第一节 归化与异化概念探源	93
	第二节 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95
	第三节 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多重因素	103
第六章	文化与翻译	107
	第一节 文化、语言与翻译	107
	第二节 中西文化差异在语言中的体现	114
	第三节 针对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	120
	第四节 针对文化差异的翻译技巧	123
第七章	修辞与翻译	136
	第一节 修辞概述	136
	第二节 英汉修辞格的形式及特征	138

	第三节 修辞格的翻译策略	151
第八章	文体与翻译	163
	第一节 文体的分类	163
	第二节 法律类文体的翻译	167
	第三节 旅游类文体的翻译	175
	第四节 新闻类文体的翻译	183
	第五节 影视剧剧本翻译	194
第九章	风格与翻译	202
	第一节 译者风格概述	202
	第二节 影响译者风格存在的因素	206
	第三节 译者风格的具体体现	214
第十章	翻译与批评	230
	第一节 翻译批评概述	230
	第二节 翻译批评体系	232
第十一章	语言学与翻译	248
	第一节 语言学发展简述	248
	第二节 语言学的发展对翻译学发展的影响	250
	第三节 语境与翻译	253
	第四节 语义学与翻译	256
	第五节 语用学与翻译	259
	第六节 语篇语言学与翻译	262
	第七节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	265
第十二章	美学与翻译	267
	第一节 翻译美学的定义与文献综述	268
	第二节 译学的美学渊源	270
	第三节 翻译美学的学科体系	274
第十三章	文学与翻译	297
	第一节 文学翻译概述	297
	第二节 文学翻译的中西渊源	298
	第三节 文学翻译的特征	300
	第四节 文学翻译的主体性	306
	第五节 文学翻译的翻译策略	312
第十四章	意识形态与翻译	320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本的选择	320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翻译中的删改	325
	参考书目	330



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我国是一个拥有长达 5 000 多年文明史的国家,自古以来就与周边民族频繁交往,翻译活动因此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翻译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从公元 67 年天竺僧侣摄摩腾到洛阳白马寺讲经与译经以来,已有近 2 000 年的历史。对于翻译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的研究一直由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们在进行探索、传承与实践。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得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式微。我国大量进行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48 年)开始的,自此佛经翻译的规模从小到大,翻译的经卷越来越多,掀起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据胡适《白话文学史》统计,“千年译经”总量竟多达 15000 余卷,^①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不仅译出了浩如烟海的经书,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他们的翻译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奠基期,中国翻译思想是在佛教学说的滋润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佛经翻译家们所进行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为以后的翻译奠定了基础,他们那种求真求实、分工协作的精神也为后世的翻译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一、佛经翻译概述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一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东汉至西晋):在这一时期共译经书近 570 部,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家,代表人物包括安世高、支谶、支谦、竺法护等。早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是由外籍僧人主译,他们认为译经须“审得本旨,了不加饰”,主张“弃文存质”,基本采取直译的方法。他们这种严格遵循原作,译文不加润

^①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4.

饰的翻译思想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中期(东晋至隋代):这一时期共译佛经 3155 卷。重要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有鸠摩罗什、彦琮、道安等。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译场,佛经翻译由前一阶段的私译转为官译,呈现出有固定场所、有组织领导的特点,翻译质量得以大大提高。就翻译方法而言,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代表人物鸠摩罗什主张意译法,提出在不违背经旨原意的情况下,译者不妨“依实出华”,在求真、求信的同时兼顾译文的通达与典雅。而彦琮和道安则主张直译,极力反对译者在译文中夹杂个人思想。道安还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把具体的翻译活动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大家。

后期(唐代):这一时期是我国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佛经基本由本国人主译,玄奘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佛经翻译大家。由于玄奘不仅精晓华梵,且深通佛理,所以在译经过程中可以直译、意译调和自如,其译文几乎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译”时代。玄奘所坚持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忠实与通顺)的翻译标准,直到今天还有意义。

唐代以后,我国佛经翻译事业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到北宋仁宗景祐年间,完全沉寂下来。至此,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古代佛经翻译,经历了它的草创、发展、鼎盛、衰落四个阶段之后,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佛经译论精选

1. 支谦的佛经译论

支谦,佛经翻译家,原为月支人,东汉末年避乱入吴。支谦受业于同族之亮,而之亮则受业于支谶,三人均闻名于世,人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博览群书,通晓六种语言,三国时期,译出了《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大小乘经典 36 部,48 卷。相传我国最早论述佛经翻译理论的文章是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厥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①

在短短三百字的序文中,支谦对于佛经翻译的本质和翻译标准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提出了早期直译派的观点,即佛经翻译应“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理论。

钱锺书先生指出:“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序)”,

^①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14-15.

由此可见我国译论的一脉相承。序文中提到的“传实”、“勿失厥意”、“因循本旨”指的就是译文首先要忠实于原文,“求信”乃翻译的首要标准;而翻译务求“通达”的标准,更是明明白白地见诸于原文的“当令通晓”、“实宜径达”等表述;至于“雅”的概念,序文中亦有提及,“仆初嫌其辞不雅”,指的是支谦一开始并不满意竺将炎“近于质直”的表达方法,可见在佛经翻译早期,“雅”已经作为翻译评论家衡量译作质量的标准之一。

2. 道安的佛经译论

道安,东晋、前秦时高僧,他曾组织主持佛经译场,厘定佛经翻译文体,也是著名的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在评论佛经翻译时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一说对我国传统译论是一大贡献,钱锺书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而支谦的《法句经序》“仅发头角”而已(见《管锥编》)。

“五失本”:

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适合)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原原本本,十分详细),至于咏叹(指颂文),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义说(梵本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长行,称为义说),正似乱辞(中国韵文最后总结的韵语),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三不易”: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佛之三明),复面(指佛“舌出复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不可及),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指第一次结集),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指五百罗汉),迭察迭书(互相审查,互相校写),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

涉兹五失本,三不易,译梵为秦,诎可不慎乎?①

所谓的“五失本”指的是佛经翻译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原文的本来面目:其一,佛经在由梵文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为使译文服从汉语的表达习惯,译者不得不颠倒原文的语序;其二,经文原文崇尚质朴,而汉语行文讲究文采,译文为了迎合汉语读者,必然有所修饰;而后三种情况则分别描述的是面对经文原本前话重提、冗长繁复的地方,译者所作的节选和删减。

所谓的“三不易”指的是古圣先贤的讲经说法有其社会时代背景,“圣人”的智慧也非凡人可及;而佛经译者作为一个平凡人要做到准确传译古代圣哲的思想,并删古以适今,实在是非常之不易!

道安本人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翻译当力求忠实于原文,认为译经应该“得本缘故”,“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倘若译者随意地删繁从简,求文而失旨,则“所害必多”。当然,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中,也有非“失”不可之“本”,比如在译文有悖于汉语的语法修辞习惯时须“时改倒句”,“言倒时从顺”,此“本”不“失”,则不成翻译。

①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37-38.

3. 鸠摩罗什的佛经译论

鸠摩罗什,后秦僧人,著名译经大师,对于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把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鸠摩罗什是一位天才的佛教文学翻译家,他一生译佛经 74 部,384 卷,著名的有《大品般若》、《法华经》、《金刚经》等。罗什译经的质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高的评价。梁启超曾盛赞:“鸠摩罗什者,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尽管罗什对于翻译方法及理论深有研究,但是留存下来的论述文字很少。不过从所见的零星论述,还是能够一窥罗什对西方辞体汉译的独到见解:

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覩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①

罗什认为天竺文章注重修辞,辞句华丽,适合吟诵,其经文亦是如此;但梵语经文译成汉语之后,虽然保留了大意,其文体的华丽优美尽失。好比把饭嚼烂了喂人,非但失去了原来的美味,更令人作呕。在这一段评论中,罗什最早提出了在翻译中如何保留原文文体特色的问题,对其后的译者可谓影响甚大。罗什在自己的译经过程中也是身体力行,往往“一言三复,陶冶精求”,不仅力求达旨,更是成功再现了西域文体的“天然语趣”(宋僧赞宁语)。

从罗什自己的译作来看,他的翻译主张不同于支谦、道安所提倡的案本直译。据《鸠摩罗什传》记载,他临终向众僧告别时曾说:“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也就是说罗什所译经卷的大部分都是经过他的删减的。罗什译经虽然对于原本有所删减,但是后世对于其译本的质量依然评价极高,其原因有三:其一,罗什不仅梵汉两娴,且精通佛经,翻译时可谓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其二,罗什对于原文的增减是以“务在达旨”为目标的,所以“虽多剪裁,还极矜慎”(梁启超);其三,正如胡适指出的,“印度人著书多繁复,正需要有识者痛加删节,方才可读”,罗什对原文所作的删减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4. 彦琮的佛经译论

彦琮,隋代名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也是翻译评论家。彦琮所著的《辨证论》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论说翻译人才素质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的“八备”说指出了一个合格的佛经翻译者必须具备以下八条:

第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

第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

第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博览经典,通晓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

第四,旁涉歧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

第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

第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銜;(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

第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

^①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26.

义理。)

第八,薄闻苍雅,粗语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①

其中一、二、五、六条论述的都是关于译者人格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三、四、七、八条论述的则是译者学识修养上的条件,只有两方面的条件俱备,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译者。彦琮的这篇文章在我国译论史上第一次全面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者本身的修养,对于后世的翻译研究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5. 玄奘的佛经译论

玄奘,唐代名僧,和鸠摩罗什、真谛、不空并称为我国佛经四大译师,曾历经艰辛,西行求法,返唐后献身于译经事业。玄奘毕生共主持译出经论 75 部,1 335 卷,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一半以上。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的中国人。玄奘不仅译经数量卷帙浩繁,而且其译经的质量也达到了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正如梁启超所言:“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翻译文学与佛典》)印度学者柏乐天也曾经评价他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的翻译在求真的同时又不失通俗,译文达到了和谐理想的境界,在翻译史上独创了“新译”的风格。

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曾对于译经作了以下阐述:

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矣。^②

从此段引文中,可见玄奘对于译文对于原文的忠实非常看重,他自己在译经过程中也是身体力行,译风严谨,音义皆美。

此外,玄奘还从其译经实践中总结出了“五种不翻”的理论:

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偏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埵”,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③

玄奘指出在译经过程中五种情况下只需音译而无需翻译: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事物名、自古已有的音译,及音译有利于宣扬佛教的场合。玄奘创立的“五不翻”原则,对于后世的翻译活动,尤其是译名的讨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4.

②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40.

③ 同上: 42.

此外,玄奘当时所主持的译场分工极为细致,分设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十一种工种,从译文的准确性到译文的畅达,层设关卡,严格把握,充分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这种分工科学、组织严密的“译场”,非常值得后世学习与借鉴,对于后世的翻译方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明清之际,从利玛窦到最后一个传教士钱明德去世,大体上历时两百年。这两百年间,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了继佛经翻译后的第二个高潮,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则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并逐步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在此期间西方殖民主义大国的耶稣会教士打着“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两面大旗,携带科学书籍闯入了封闭多年的中华大地,译述西方科学书籍和宗教书籍,从而在我国引发了一个科技翻译高潮。推动这次翻译高潮的,除了来华耶稣会士外,还有信教的或不信教的但与传教士相熟的中国学者。

尽管西方传教士来华最高宗旨是为传播天主教和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促进中国的科学与翻译事业的中介力量,他们也起到了传媒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这场以传译西方科技为主流的翻译活动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除了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以外,利玛窦也是最早将《四书》译成拉丁文的译者。他在明万历年间来华传教,主张把中国的孔孟之道与天主教教义相融合,向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献。

在此次翻译高潮中,中国人译者中最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三人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他们主要的有影响的译著是西方科技类著作。徐光启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翻译家,他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又和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开创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李之藻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圆容较义》、《乾坤体义》和《寰有诠》、《名理探》等书,其“后半生精力,尽瘁于译书刻书,输入西洋学术”。^①

明清两代在译学理论、方法研究等方面留下的论述虽然数量非常有限,但意义不小。

如1607年利玛窦在《几何原理》(徐光启合译)译序中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赅赜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②故他与徐光启合作时,“反复辗转,求合书本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稿”。从中可以看出其论说译学之难以及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徐光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

李之藻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足见他的翻译充满了其苦心和创见。他在《寰有诠》的译

①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269.

②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58.

序中写道：“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可见《寰有诠》虽只是节译，但所译之文皆忠实于原文。李之藻在译述中，坚持“辞能达意”的原则，所创译的不少术语译名，至今沿用。

杨廷筠的翻译虽然没有徐光启、李之藻那样多，然而他在为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述的《西学凡》写的序言中，论述了翻译之难，并特别提出了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推厥所繇，彼中士人，学问修诣有次，不能躐等径造。极开敏者，必廿年乃成。再三考试，周德不乱，乃始听许远游。迨入中华，间关数载，又以数载习语，认字数载，通经学文，始能融会两境，义理有所阐译，而老将至矣。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共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殒志以歿，而学不尽传。”^①

虽然明末清初的这次翻译高潮无论从延续时间、译著数量、译者队伍和翻译文论来看，都远不能和前一次佛经翻译相比，但是这次翻译高潮有其重要特色。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中所说：“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②在这两百年的翻译高潮中，除了宗教文学翻译之外，西方大量的天文、数学、物理、机械、生物、医学、军事、哲学著作被译介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第三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

一、翻译高潮概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的70多年中，中国从一个满清统治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面对民族危亡，图自强，谋复兴，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在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此次翻译活动与之前中国引进佛经完全不同，后者主要是为了丰富我国文化，心态平和悠然，近代翻译则是在受到西方入侵的压力，“以将亡而始兴学”，为了“师夷之长技”，这种紧迫甚至危急的情形下进行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分崩离析之际，有意识地睁眼看世界，提出中国有必要向西方学习进步技术的第一人是林则徐。按《圣武记》的记载，林则徐在广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而且他还雇人翻译西洋的新闻报道，欲求知己知彼，“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酋骇为神助”。在林则徐主持下，翻译过《四洲志》、《华事夷言》和《各国律例》等书。

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主要由三个机构进行。同文馆主要翻译公法，制造局主要翻译工业制造内容，广学会翻译宗教类书籍。同文馆相当于外语及基础西学教育机构，满清贵族奕訢于1860年奏请创立同文馆：

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办，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唎、啡、咪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飭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

①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71.

②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269.

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①

据《京师同文馆馆规》,学生共学习八年:

-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②

李鸿章于 1863 年奏请在上海成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即广方言馆,考选江浙一带少年及年轻小官吏入馆学习。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在当时是译书较多的洋务派机构。该局于 1867 年设翻译馆开始译书。据《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的记载,该翻译馆所译书籍门类极多: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地学、天文行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路兵法、年代表、新闻纸、造船术、国史、交涉公法等等,共计一百六十三种,附刊三十二种。

翻译馆译书的方法在这本《事略》中也有记述: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斲,其讹则少而文法则精。^③

那时主要的翻译方法基本上是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录。一方面照顾到原文意义理解的准确;另一方面使译文“合于中国文法”,便于理解。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叶翰在他的《论译书之弊》中提到了,诸如译作出版缺乏介绍学科知识的递进层次,中西语文差异巨大造成译作难解等问题。精通外文的马建中也指出,由于译者外文水平低下,“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马建中接着提出了他所谓“善译”的标准:

……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栞句比,以考

①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89.

②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38.

③ 同上: 342.